

导 言

2020 年伊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为应对这一罕见的大流行病给公共卫生、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都依据各自国情，采取了不同的防控举措。为了厘清各国抗疫的思路、机制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合开启了“博雅德信工作坊：外交官眼中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系列线上研讨会。

自新冠肺炎在法国迅速暴发以来，马克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关闭学校，停止一切非必需商业活动，严格限制本土与海外的往来，发布禁足令；承诺缓征或减免税金及社会分摊金，启动 450 亿欧元“经济紧急计划”以稳定就业和扶持企业；宣布国家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法国疫情出现“缓解”迹象。但也有不少法国人对未来充满忧虑，一方面，“法式抗疫”能否有效地抑制病毒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法国经济正经历自 1945 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如何尽快渡过危机成为法国政府的首要难题。

法国的“抗疫”举措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哪些得与失，在整个欧洲防控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疫情对中法产业链合作的稳定与安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对此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与措施？此次疫情给欧洲格局乃至世界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变化？本期工作坊邀请到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翟隽、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杨壮教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郑

志杰教授从各自研究领域对上述问题进行研讨。

“博雅工作坊”第31工作间

外交官眼中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三）：法国

2020年4月27日

本期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主持。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兼驻摩纳哥公国大使、现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隼先生作主旨报告。

翟隼大使首先梳理了法国疫情发展的基本情况。法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疫情的发展可以分为上下半场。从1月下旬至2月下旬是上半场。1月24日，法国政府公布了3例新冠肺炎输入型病例，法国正式出现疫情。此前法方曾经制定了一个“四阶段防疫预案”。第一阶段是“防输入”，主要以防止疫情输入为主；第二阶段是“延缓和遏制”；第三阶段重在“减损”，减少损失；第四阶段是“后疫情阶段”。

上半场是第一阶段，法方认为疫情还没有在境内传播，主要任务是防输入。一方面加强医疗系统的预警，检测到病例立即对传染链进行追踪，这个阶段做到了应检尽检和应收尽收。法航从1月22日起逐步暂停了往返中国的航班，并且对从武汉撤回的侨民进行了严格的隔离检测，减少输入的风险。法方的上述措施还是收到较好的成效，至2月24日法国仅有12例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其余11例都先后康复了，疫情没有在当地出现大范围传播。

下半场从2月21日开始。2月26日，位于巴黎北部100公里的瓦兹省发现法国首个本土死亡病例，这一地区随后出

现了聚集性感染。之后与意大利、瑞士接壤的上萨瓦省，以及德国、瑞士接壤的上莱茵省也都出现了聚集性感染。2月29日，法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例，政府宣布疫情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病毒开始在国内传播，但尚未在全境广泛出现。这个阶段法国政府的防疫策略是延缓和遏制疫情，医疗系统仍然尽可能地追踪传染链，进行核酸检测。此后疫情在法国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由点到面，由东向西的发展趋势。

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此次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的特征。3月12日法国累计确诊病例为2876例，其中重症129例，死亡61例。当晚马克龙总统发表全国讲话，称本次疫情是一个世纪以来法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强调法国仍处在疫情的初期，宣布了应对疫情的一些相关的举措，主要包括从3月16日起全国的学校停课；医院将延后一些非必要的手术和治疗，为救治重症患者留出床位；政府将最大限度地动员包括退休医生和医科学生在内的医护后备力量。

3月14日法国累计确诊4500例，72小时内翻了一番。当晚，菲利普总理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从次日零时起关闭全国的餐厅、咖啡馆、电影院、舞厅等非必要的场所，但市镇选举第一轮投票还是如期举行。随后法国卫生总局局长表示疫情实际上已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疫情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意味着法国政府的策略，从延缓和遏制转为了减损：不再也没有能力进行传染链的追踪，不再也没有能力逢人必检；通过社会管控措施来减少人和人的接触；医院只接受重症患者，轻症患者则居家隔离自我密切监测，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再拨打急救电话，

由医院评估之后接收。

3 月 16 日，马克龙总统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从次日起开始为期至少 15 天的禁足，推迟原定于 3 月 22 日进行的市镇选举第二轮投票；口罩要优先供应医院诊所医护人员使用。同时，欧盟和申根区也宣布关闭入境口岸，禁止非欧盟、申根区和英国公民入境。

实行禁足后，法国疫情仍然呈延续上升趋势。至 3 月 19 日，法国检测确诊病例超过 1 万，死亡 372 人。4 月 1 日，检测确诊将近 57000 人，医院的死亡人数超过了 4000。4 月 2 日起，法国开始公布养老院等福利机构的数字，当天初步统计上述机构累计确诊和疑似病例达到了 15000 例，死亡将近 900 例。4 月 9 日起，法国的重症人数有所下降，显示疫情有所缓和。但法国疫情仍处于“高位平台期”。截至 4 月 26 日晚，法国官方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字为累积计确诊 124575 例，死亡 22856 人。

翟隽大使认为，法国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反复强调两大原则，即“适度性”和“差异化”。适度性主要体现在应对举措逐步加码，差异化主要体现在由点及面。但是在实践中，法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有点像挤牙膏，没能跑到疫情前面，而是在疫情后面跟着跑，好像是让疫情牵着鼻子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客观地看，法国在疫情防控中暴露了一些不足，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点盲目自信。在医疗卫生领域法国算是传统强国，2019 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中法国排名第 11 位，法国的人均寿命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面的，并且法国被认为是“应对流

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之一。”法国政府最初认为新冠肺炎只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事”，后来在防输入的时候也是只防亚洲不防邻国，眼睛盯着中国。法国政府相信自身医疗和科研水平，低估了社会管控措施在防疫中的作用，导致了法国民众麻痹大意。疫情全面暴发后，法国才发现自身的防控物资储备严重不足。法国口罩储备曾达到过 10 亿只，此后因为预算等各种原因，到疫情暴发时只剩 1.5 亿只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根本没有。由于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全法只有 4 家口罩生产商，每周最多生产 330 万只口罩，而每周仅仅医护人员就需要 2400 万只。另外，法国的检测试剂、呼吸机和重症床位也都严重不足。总体上看，疫情暴发后法国政府有点手忙脚乱，一边救火，一边找水。

二是有点瞻前顾后。疫情暴发后法国政府想得比较多，结果贻误了战机。疫情蔓延时期正好赶上法国的地方选举，这在法国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第一轮投票正好是 3 月 15 日。马克龙总统一一直高调表示，“民主生活要继续”，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为争取选票做最后一搏。3 月 15 日当天，超过 2000 万法国人上街投票，而第二天马克龙总统就被迫宣布全国禁足，这个操作也引发很大的争议。

法国政府防疫动作迟缓还受经济因素的影响。2019 年法国经济增长连续第二年下滑，跌到 1.3%，失业率为 8.1%，停工停产等防控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巨大。法国统计局估算全国每禁足一个月，预计损失 3 个百分点。据 4 月 22 日法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在法国有 1020 万私企员工处于“部分失业”状态，占全国私企员工的一半，法国规定政府须向这

些“部分失业”员工进行补贴。

三是法国政府的某些提法或做法有点似是而非。在口罩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法国政府 3 月 13 日颁发了一项政令，宣布征收全国所有法人持有的医用口罩，保障医务人员使用。但同时，政府对民众在宣传的时候反复灌输口罩对健康人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戴口罩不如常洗手，且普通人并不懂口罩应如何戴。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普通民众防疫还是有影响的。

四是在疫情面前，法国人自由散漫的民族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在禁足令生效前夕，法国人纷纷上街，去餐馆酒吧享受“最后的自由”。在禁足令生效 20 天后，法国警察针对不遵守禁足令、违规外出等行为一共开出 53 万张罚单。

尽管法国抗击疫情的表现有诸多不足，但客观地看，每个国家在选择防疫策略的时候，都是从本国的国情和体制特点出发的。其实大多数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和法国相似的做法，这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和民族性格因素。法国在抗疫过程中还是展示了其社会可贵的韧性。

法国医疗系统 2 月下旬就启动了“白色计划”。全面动员医学院的学生、刚刚退休的医生等后备力量支援前线，并且争分夺秒地增加重症床位的数量。法国此前重症床位比较少，只有 5000 张，但是在 3 月底已经增加到 1 万张，目标是增加到 1.5 万张。疫情早期虽然防疫物资比较匮乏，但是医护人员表现出了极高的敬业精神，有些医护人员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仍然冒着风险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法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全体出动进口口罩，同时开足马力增加本地的

生产，到 4 月 1 日法国的口罩储备已基本满足了医护人员的需要。

疫情面前，法国各个地区、社会各阶层、军民之间展现了相当的团结。政府动用军机、高铁、轮船把部分重症病人送到医疗资源相对宽裕的西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和南部地区医院也派了医疗人员支援东部。军队 10 天内搭建起一座战地医院，配有 30 张重症床位。各行各业可以说都展现出了大局观，很多汽车企业比如雷诺都开始转产生呼吸机，LV 等奢侈品巨头转产生酒精、免洗洗手液、口罩等等。各大媒体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每天晚上 8 点所有的民众自发为医护人员鼓掌打气，场面非常感人。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法国基本实现了其制定的拉平疫情曲线的目标，医疗系统总体上也扛住了高峰冲击，没有发生明显的过载，没有被迫进行选择性的治疗。总的来看，政府的防疫行动基本做到了“程序正义”，大多数民众还是持接受的态度。

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两个核心大国，是领头羊，欧洲对法国来说非常重要。面对疫情，法国努力在欧洲发挥引领作用，扮演抗疫行动协调者和欧盟团结捍卫者的角色。意大利疫情暴发后，法国在自身储备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提供了 100 万只口罩、2 万件防护服，还向德国提供了 7 吨防护物资，向欧盟其他国家出口了 200 多万只的口罩。随着疫情扩散，法国积极呼吁欧洲各国协同合作，避免各自为战，特别是强烈要求各国采取边境管控措施的时候要统一步调。法国外交部在疫情初期协助欧盟的 22 个成员国，从全球各地包机撤

回 15 万侨民。在法国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法国政府也争取到德国、卢森堡、奥地利等国家接收了法国一部分的重症患者。

在经济方面，法国高举团结的大旗，在德国和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居中协调，推动欧盟最终搁置分歧，通过了 5400 亿欧元的纾困计划。马克龙总统把欧洲能否团结应对疫情视为欧洲建设面临的重大考验，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可以说，法国是这次欧盟联合抗疫最积极的推动者。

对于中法两国合作抗疫，翟隽大使表示，法国是第一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今年疫情发生后，在维护多边主义共同抗击疫情方面，中法两国保持着比较好的合作。

疫情发生后，法国总统、外长等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表达了慰问支持，并向中国提供了 3 批医疗物资援助，包括 83.22 万医用口罩，630 套防护服，96.5 万副医用手套。在法国疫情蔓延时，习主席向马克龙总统发去了慰问电，打电话向他表示支持，也介绍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做法。中国也向法国提供了一些物资援助，包括 5 万只医用 N95 口罩，1 万套医用防护服，100 万只医用外科口罩，150 万副医用手套，并且还准备向法方提供数万份检测试剂。

总体上看，中法之间抗疫合作情况较好，法方调动民航飞机在中法之间搭建空中桥梁，法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获得了 7 架次的政府包机许可。自 3 月以来，民航局已批复法方共 117 班货机的申请，主要用于运送购买的医疗物资。除此之外，中法在抗病毒药物研究和疫苗研究方面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和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正在筹划在非洲搞中法非三方合作。

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相对是友好的。特别是领导人和政府层面，他们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斗争。马克龙总统在和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表态非常好，认为在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展现了巨大的勇气，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短期内控制了疫情，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到后来法国疫情严重时，习主席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表示，感谢中国提供友好帮助，愿全面加强合作，对外展示两国共同抗疫的坚定决心。

近 3 个月，习主席和马克龙通了 3 次电话，是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最多的。中国疫情严重时马克龙在电话里表示，将向中国提供三方面支持：一是尽快提供防疫物资；二是提供技术性的帮助，派法国的医疗专家和防疫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交流合作；三是提供政治上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他要亲自访华。如果不是此后法国疫情严重，原本 3 月下旬他会来中国访问，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人民抗疫的斗争。法国一些前政要也在社交媒体上对我们表示支持。比如前总理拉法兰，2003 年非典的时候他曾来中国访问，体现了关键时刻患难之交，给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另外，法方在多边场合比如 7 国集团开会时的表现也不错，反对美国提出的“武汉病毒”说法，对于共同抗击疫情，法国在联合国、G20 等一些国际场合表现也都是不错的。

但也应该注意到，3 月 29 日法国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报》和法国电视台“政治问题”节目里有一段不好的言论，说“利用正在发生的疫情进行宣

传、美化确实比较容易，我指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干的事。不应该把疫情工具化，不应该算计，这么做不合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媒体消极的声音也比较多。

总的来看，法国在西方大国中，是与中国共同语言比较多的国家，两国的关系可以说在高位运行。中法在维护多边主义、共同抗击疫情上保持比较好的合作，到目前为止法国官方还没有附和美国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攻击，总体表态比较好。

翟隽大使认为，法国的疫情还在继续，但是专家学者已围绕疫情对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和文化的巨大冲击发表看法，展望“疫后”的世界形势。

第一，关于国际体系和格局。普遍认为这次疫情是二战之后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影响深远，影响到什么程度还难以估计。多数学者表示忧虑，认为疫情之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国际社会”这四个字名存实亡。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将进一步蔓延，一系列多边设计恐怕将加速解体。也有观点认为疫情是一次纠错的机会，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团结互助的重要性，以及分裂与隔阂的危害。从长远看这轮调整有助于构建新的国际主义。两种观点截然不同。

很多学者关注疫情给国际力量对比带来的变化，称世界各大力量在同病毒做斗争的同时，还在进行一场影响力争夺的暗战。受疫情冲击西方霸权加速衰落，美国进一步丧失世界领导力，欧盟自顾不暇，中国借抗疫外交填补真空，正在成为最大的赢家。

危难时刻欧洲国家各自为政，将给民众留下复杂的集体记忆，欧洲一体化面临更大的信任危机。未来欧盟将面临新的艰难的抉择，要么在疫情倒逼下加快联合自强步伐，要么加速衰落。

第二，关于世界经济。各方普遍认为，病毒带来卫生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双重危机。2020 年世界经济可能出现 5%左右的衰退，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贫困人口增加。各国纷纷出台经济支持政策，斥巨资补贴中小企业、救助失业人员、担保银行贷款。但如果疫情持续，将导致全球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像意大利这样财政脆弱的南欧国家，恐怕将再次陷入债务危机。

很多专家认为，疫情将重塑世界经济模式，加速“去全球化”的进程。西方国家将加大对战略性经济部门的保护，坚定“再工业化”决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当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将演变为以区域性合作为支柱的“多中心”产业链。马克龙在一次谈话时也讲到，要接受教训，将来疫情结束后，欧洲不能再依赖别人，要加强对一些重要企业和关键产品的主权。但也有观点认为，疫情不会改变全球化进程，产业转移说易行难，或将只是个别现象，并且产业链的重组最终将有利于消费活跃的地方，人口老龄化的欧洲难以从中获益。

第三，关于社会治理模式。各方普遍对欧美国家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感到失望，对当前西方民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反思。认为政府过于松懈，政治家缺乏责任感，党派和经济利益至上，这些是导致应对不力、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

部分专家指出，西方因傲慢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国经验视而不见，延误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时机。

不少人对中国的道路、制度偏见根深蒂固，质疑中国数据造假，鼓吹新加坡、日本、韩国、甚至台湾的抗疫模式，顽固坚持“民主抗疫”的优势。有学者称疫情没有结束，说民主制度就此衰落言之尚早。民主制度有两面性，一方面因其散漫、无序的自发倾向而注定比“威权制度”更软弱，另一方面又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此次疫情促使民众反思，推动政府和社会建立权利与责任更为平衡的契约关系。

第四，关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多位学者反思疫情折射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民众对其“毫无依据的安全感”和过度自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儒家文化的服从性和集体凝聚力，使得亚洲国家在应对疫情时更加迅速有效。

有学者谈到，疫情也充分暴露了后现代文明的脆弱，将改写人类的生活方式。交通的便利和无限制的出行旅游加速了疫情传播，迫使人们对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做出改变，更加重视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加速经济的生态环保转型，并且对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和个人隐私保护需要重新认识。

翟隽大使表示，对于疫情前后的世界变化，目前专家学者仍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未来形势还处在变化发展中，充满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

首先，疫情对法国和欧洲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造成的损失巨大，影响深远。但长期看，形势总体可控。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不会大乱。欧洲一体化趋势也不会逆转。对中国

来说，应继续在联合国、世卫组织、G20 的框架下加强与欧洲的合作，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和在非洲领域。在经贸方面可以继续做好大项目合作，要推动尽早签订中欧投资协定，实现更多利益捆绑。通过做法国工作维护欧洲市场和中欧产业链。

其次，在国内抗疫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虽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但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战略压力。中美两种抗疫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展现的能力使得美国更加焦虑，对华遏制的冲动和冒险性在急剧上升。其他大国的危机意识和自保心态，给我们从全球战略层面运筹中美关系增加了新的复杂因素。当前形势下，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对美还是要坚持一贯的原则，两手对两手，多手对多手，该斗争的坚决斗争，能合作的尽量合作，但是不抱幻想。与此同时高举团结合作的旗帜，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三，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今天外交的宗旨仍然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我认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在战略上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外交要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开展工作，要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外交工作要缜密、慎重、要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表态严谨。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在发言中表示，首先，这次疫情确实让我们看清了法国的内政。法国是在流行病病毒研究方面非常先进的国家，这令它非常自信。但在马克龙成为总统以后，法国政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年轻化。作为年轻

的政治家，马克龙总统精力充沛，在此次疫情中展现了敢于承担责任、勇于面对困难的面貌。但也应该看到，这届年轻的政府缺乏应对疫情的经验，有点措手不及，给人一种欠缺人文关怀的感受。

第二，中法一直有着非常好的双边政治关系。疫情之初，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是唯一未关闭的外国驻汉总领馆，此后法国驻华大使明确表态在4月疫情缓解后，将带着所有法语国家大使一起去支持武汉，这在当时表达了法国一以贯之的亲华态度。但同时疫情也导致了中法关系特殊性出现了被弱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媒体方面，法国的舆论跟西方其他国家的舆论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次疫情是一个警示。

第三，法国发挥着欧洲协调者、领导者的作用。但是，此次疫情德国交出的答卷非常好，抗疫非常成功。现任欧盟主席也来自德国，不知不觉间德国在增强自身在欧盟的影响力，可能对欧盟的走向起到重大作用，也许这比法国人所说的或者摆出的姿态更重要。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是否会因自己在疫情中的答卷不出彩而减弱，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杨壮教授表示，过去十几年他本人在国发院教授的是MBA商业学课程中的比较管理学，主要涉及全球领导力和跨文化领导力。

领导力是一个领军人物带领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奋斗的艺术。当前，在全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能否及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适应本国国民经济、国民生命安全的决策，展现了这个国家领军人的特质。马克龙总统能够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在疫情初级阶段发

生的错误，并且不坚持自己的错误，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领导力方面给特朗普打分，他将是不及格的。领导力是一种艺术，随着国家情景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领导与下属互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符合国家的情景，在不同文化情景、经济情景之下，领军人物也一定要有自己特殊的特质，领导力是跨情景、跨文化边界的能力。

领导力有很多种模型，其中一种是汤姆彼得斯公司的荣誉退休主席詹姆斯·库泽斯在其著作《领导力》中提到的五项：身体力行、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

如果用这五项衡量特朗普，可以发现，首先他没有身体力行，包括坚持不戴口罩；几乎没有愿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关注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挑战现状，现状出问题后，他开始甩锅，不仅是对中国、欧洲甩锅，也对自己国内的州长甩锅。前三条没有做好，就很难真正做到使众人行，激励人心。美国出现重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间出现了很大偏差，最高领导者没有提出共同愿景，没有做出令属下跟他一起共同努力奋斗的战略决策，最终耽误了防疫时机。

马克龙比特朗普小 30 多岁，虽然缺乏经验，但从领导力模型看，卓越的领导者所需要的基本素质他都具备。马克龙 3 月的讲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作为领军人物非常难能可贵。身为领军人物，如果不能真正身体力行，去团结一切力量，那就是不合格的领导。在这方面，可以给马克龙打 B+ 的分数。

一个国家的领军人物在疫情之下迅速决策，远见、专业

精神极为重要，这是一个国家战胜疫情的必要条件。法国对疫情的控制并不像德国那么好，虽然比意大利、西班牙好，但并没有控制好。我认为，虽然一个国家的领军人物的领导力特质是战胜疫情的必要条件，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包括价值观，是保障领导力实施的充分条件。法国在历史上对个人自由、国家民主的追求，对统治者特别是专制主义者的憎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法国是极为开放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较之于疫情挑战，马克龙遇到的文化挑战更大，如果克服不了这种挑战，即便做出再伟大的努力或发挥更大的榜样作用，也难以实现目标。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这次疫情中反映的尤为突出。东方无论是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地区，还是韩国、日本，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西方人比如美国人抗击特朗普封城，拿起大牌子宣称“我们要自由”的做法截然不同。我们认为，东方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而西方则是宁愿在世上痛快的活一遭，也不愿意遭受宿命。因此，疫情之下，东方是义务隔离，西方则是放任自流。中国的文化理念、思维在疫情过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这些方法只能在中国环境下才能实现。世界是多元化组成，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人文、历史、地理和价值体系传承。疫情造成未来形势的变化，疫情之后必然不一样。未来，中国需要在几个方面真正的做好：首先，要提高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度。信任度最关键的点是透明度，即一定要诚信，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诚信。第二，提高软实力。中国有特别久远的历史文化，如果在软实力方

面不能提出自己的思想价值，世界就会认为中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取得了伟大成就，而在意识形态或者是重大的价值观上不会对我们认同。最后，技术高度发展，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挑战，比如环境、空气、土壤的污染，如果在未来发展中不关注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就会导致本末倒置。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博雅讲席教授郑志杰在发言中表示，此次疫情是 1918 年大流感以来最大的公共危机，把健康和卫生问题推到了全人类面前。21 世纪的前 20 年，发生了多次规模类似的全球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从 2003 年的非典，到 2005 年禽流感，2009 年猪流感，到之后的埃博拉，影响的人群越来越多。新冠肺炎发展到现在，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幸免。这种情况将全球卫生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摆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

此次疫情表明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卫生安全问题，不仅是在对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监测准备方面，也包括对各种情况的应对。在全球卫生方面，欧美国家第一道防线是预防，第二道防线是防输入。第二道防线更多的是考虑到疫情在其他国家发现，能够把防止输入做好，基本上可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此次疫情几乎造成每个国家的两道防线全面崩溃。

这次疫情表明，中国需要加强全球卫生治理，尤其是在健康领域各方面的能力。过去我们在涉及全球治理的很多国际场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很多议题，不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应对方面经常出现不表态、无所谓、无诉求的三无情况。未来，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必须

要理解议题、把握议题、提出中国的诉求。此外，要主动出击，更多地在全球卫生领域提出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方案，主动设定议题。这涉及到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话语权的问题，亟待加强。

在外交层面，过去卫生问题在国家的外交层面排在靠后位置，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度。此次疫情在全球蔓延反映出，健康问题会给一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领域造成严重影响，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非常重要。

在国际援助方面，过去中国更多的是受援国，但现在这一角色正在发生转变。比如长期开展对非医疗援助，派遣医疗队到 50 多个非洲国家，为他们提供卫生和医疗方面的帮助，在这领域实际上还有很多拓展的空间。比如在此次疫情下，可以通过大使馆协助医疗队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

对于中法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郑教授认为，随着疫情蔓延，非洲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相对薄弱的地区，很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中法在非洲抗疫问题上有很大合作空间，两国政府应该加强合作，尤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或者通过三边关系，加强对非洲的支持。

此外，过去 50 年，英美两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话语权相对较为强势，法国和德国则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两国也在不断努力扩大话语权。例如，去年法国 9 所大学成立了全球卫生联盟，加大全球卫生领域的研究，包括对全球卫生治理问题的研究。德国也在柏林建立了全球卫生研究所。在这方面，中欧、中法、中德有很大合作空间，希望通过中欧合作的方式走出一条，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道路。虽然现在

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批评、断供，未来甚至有可能另起炉灶，但我相信中欧合作对于全球卫生各领域的发展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此次疫情也迫使全球重新考虑，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全球化进程、能源流动、贸易发展、自然环境恶化是影响全球健康或全球卫生安全的重要因素。未来，中国必须继续加大在全球卫生领域的研究合作，在全球卫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卫生安全不仅涉及医学领域、卫生领域，还涉及更多的其他相关领域，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形成全面的解决方案。

互动环节中，与会嘉宾与现场听众就上述发言进行了讨论。

提问：当前全球化形势下，公共卫生问题逐步演变为国际问题，远远超出了卫生领域，特别需要跨学科的观点。就法国来说，这场疫情对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走向、对欧洲一体化是否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紧张，而法国与美国、英国是传统的盟友。在特朗普政府声称追责中国的情况下，马克龙总统未来是否也会提出追责中国政府？疫情会对中法两国、美法两国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翟隽：关于欧洲一体化。一体化最近几年来确实面临很多的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次疫情像刚才讲的，使得欧洲一体化又面临一些新的考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

家间，在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甚至在世界各国间都出现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可能会倒逼欧洲国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采取更多的措施，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英国脱欧本来就是欧洲一体化道路上的挫折，但英国脱欧并没有造成连锁反应，其他国家没有继续脱欧。总的感觉趋势不会逆转，肯定会想一些办法。

关于法国和美国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承认他们是同盟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但是我们说法国在西方国家里面是比较特殊的，是和我们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刚才说了，在历史上有多个“第一”。首先就是戴高乐时期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和我们建交国家快200个了不算什么，但是当年，1964年法国和我们建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候，国际上比较孤立的时候，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都不好，国内有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是个重大的胜利。中法关系一直有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法国政治上有独立性。法国是文化大国，在文化上，在启蒙思想方面有很多贡献，因此在文化上有非常强烈的自豪感，而这种文化上的自豪感反映在政治上有强烈的独立性，他不愿意和美国完全绑在一起。

我们看今天的国际形势，美国搞单边主义，法国追求多边主义。美国和法国是同盟的关系，但是很多问题上他们看法不一致，尤其是美国出了特朗普总统的情况下。所以他们之间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今天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国际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简单的分黑和白。从我们国家的角度讲应该争取更多的朋友。我们现在愿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发展关系，包括美国，我们并不想把关系搞坏，现在关系搞得紧张是美国造成的，不是我们，我们是被动的。在当前形势下中法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疫情带来挑战，因为疫情的复杂性使得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求同存异，趋利避害，尽可能的搞好关系。争取在新的历史时期使中法关系保持好传统，使法国继续成为我们在西方的朋友。马克龙总统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总统，希望在马克龙时代能够继续保持中法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

董强：欧盟确实令人担忧，但是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基于欧洲人共同的利益，欧盟一体化绝对利大于弊。我认为欧盟的前景是绝对积极的，恐慌和担忧都是临时性的。至于法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要明白法国有独立性，同时它不是超级大国，但曾经是很强的强国，也是当今世界上依然起到重要作用的国家，同时在欧洲能够起到龙头作用的国家。

马克龙总统有非常清晰的战略，可以说他是所有西方领导人中最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有明确的价值观推进意向，知道法国在欧洲要干什么，跟中国、俄罗斯需要采取怎样的态度，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至少在马克龙当总统的时期，法国不可能出现跟美国走得太近、跟中国抗衡的情况。

翟隽：说到法德在欧盟作用问题，法德是欧盟的两个核心大国，两个领头羊。当年没有法德就没有欧盟。德国经济上比较强。我们承认默克尔是资深的政治家，威望高，能力强。马克龙是后起之秀，年轻有为，有远大的抱负，而且默

克尔很快要退休了，将来马克龙的作用不可小瞧，习主席的话，将来没准儿是欧盟的顶梁柱呢。马克龙最近有一个讲话，他认为今天的世界是美国和中国两强，作为欧洲来讲，不能依附于两强中的任何一个，这也说明他和美国的关系了，必须要成为独立的一极，法国自己做不到必须依托欧洲，让欧洲成为独立一极，他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法国是欧盟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唯一的核大国。法德在欧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离不开它们两个，离开了它们两个欧盟不可能成为欧盟。从目前来看，法德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总体上默克尔和马克龙合作比较好，包括现在新的欧委会主席，也是马克龙建议的，虽然是德国人但是法语也很好。

提问：翟大使刚才讲到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您作为资深职业的外交家，从您的角度，从外往里看，您觉得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像杨壮老师讲的，把我们的诚信传递给法国，赢得法国的信任。

翟隽：谢谢，这个问题太大了。赏是搞好关系的基础。当年我们比较穷比较落后，今天我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现在是中等国家，中等强国，GDP 排五六位吧。这个时候，我能想到的，第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我们更加的发展，中法之间共同语言多的地方主要是文化、经济、投资、贸易，你说意识形态要让我们一样，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国情不一样。我们首先要能把自己事情做好，用我们实际的成绩让他们认可和信服。

其次我们要求同存异，法国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相信他们也从我们这里借鉴了很多。去年习主席去

法国访问的时候，马克龙送的礼物是 1688 年法国出版的《论语导读》，马克龙说，法国启蒙时期很多大家受了孔子的影响。马克龙去年下半年来访的时候习主席送他一本《茶花女》，是 19 世纪末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两国文化相互影响和借鉴是相互走近的基础和动力。我们要寻找更多的共同点，在共同点上多做文章。

那些不同的地方，是意识形态，估计想说服法国不太可能，他说服我们更不可能。我当驻法大使五年多，从来没有想过说服法国，我相信他们也不可能说服我们。怎么办，就是求同存异，世界是多元的，不意味着别人发展我们不能发展，也不意味着我们发展别人不能发展。可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世界上广交朋友，求同存异，为我们发展创造好的条件。你发展好了人家才认可你，尊重你，我们的故事才更有说服力。

钱乘旦教授在对本期工作坊总结时表示，今天关于法国疫情的观察与分析的研讨非常成功，翟隽大使从法国疫情发展、马克龙对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中法相关领域合作及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等方面作了精彩的报告，各位参会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上述议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此次疫情、分析疫情下中法关系的未来。今后研究院还将举办更多与区域国别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活动，期待大家能够再次参与。